

语言

第三卷

Language & Speech

Speech

刘利民 周建设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Language & Speech

语 言

(第2卷)

刘利民 周建设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刘利民、周建设主编 -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81064-171-9

I. 语… II. ①刘…②周… III. 汉语-语言学-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100 号

YU YAN

语 言(第 2 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5 × 1270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07 千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35.00 元

学术顾问

王福祥 北京外国语大学

裘锡圭 北京大学

陆俭明 北京大学

蒋绍愚 北京大学

戴庆厦 中央民族大学

王 宁 北京师范大学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张炼强 首都师范大学

A. P. Martinich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主编

刘利民 周建设

编委(按音序排列)

冯 蒸 黄天树 李均洋 林 立 刘利民 汪大昌 王 陆
周建设

目 录

- | | |
|-------------|--|
| (1) 周建设 陆俭明 | 面向 21 世纪的汉语研究 |
| 冯胜利 张炼强 | |
| 陈 波 徐通锵 | |
| 李均洋 董 琨 | |
| 顾曰国 林连通 | |
| 黄 征 蒋绍愚 | |
| 杨成凯 | |
| (38) 邵荣芬 | 《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
——声调、韵母部分 |
| (70) 李如龙 | 《渡江书十五音》导言 |
| (82) 郑张尚芳 | 汉语方言声韵调异常语音现象的历史解释 |
| (103) 冯 燕 | 论《切韵指掌图》三/四等对立中的
重组和准重组 |
| (179) 洪成玉 | 汉语词组的语法属性和语法功能
——王力先生关于词组的论述 |
| (189) 张炼强 | 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之一)
——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
动词 |
| (209) 苏新春 | 普通话词汇系统对方言词的吸收与
更新
——《现代汉语词典》方言词研究 |
| (225) 储泽祥 | 现代汉语的“半 A 半 B”式
——附论涵盖义与细节义 |
| (237) 周建设 | “可能”与“必然”的模式语义考察 |
| (254) 哈平安 | 语言的心理现实 |

- | | |
|--------------------|--|
| (264) 冯胜利 |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柯罗克的学术特点 |
| (275) 冯 利 | 社会语言学创始人拉波夫 |
| (286) 黄天树 | 关于甲骨文商王名号省称的考察 |
| (302) 沈 培 | 说郭店楚简中的“肆” |
| (320) 刘 桓 | 金文札记(四则) |
| (327) 岩佐一枝 | 关于阿细彝语的助词 <i>gi</i> ¹¹ |
| (336) 张 威 | 试析日语结果可能句的表述原理 |
| (347) 顾江萍 | 日汉同素反序词初探现象 |
| (353) Jianshe Zhou | The Stud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Pre-Qin
Dynasty |

面向 21 世纪的汉语研究

(研讨会纪要, 据录音整理)

编者按:2000 年 6 月 21 日, 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编辑部召开了“面向 21 世纪的汉语研究”研讨会。与会人员除首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中心和《语言》编辑部的同志外, 还邀请了部分校外专家参加讨论和指导。会上, 专家们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指导意见。蒋绍愚先生和杨成凯先生因故未能与会, 他们作了重要的书面发言。现将全部发言发表出来, 以飨读者。同时, 值此机会向专家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仁致谢。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咱们今天开一个小规模的会。本来是由刘利民教授主持的, 他今天临时有外事活动不能出席, 特要我代表他向各位, 特别是向校外来宾表示歉意, 更代表他表示欢迎。会议的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面向 21 世纪的汉语研究, 第二个是《语言》刊物编辑的方向。第一个题目好像比较大, 似乎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校所能谈的, 要是北京大学, 或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用这个题目来座谈才相称。但是, 我们今天在小范围来谈谈这个题目, 并不是以为我们能解决它, 而是希望我们学校的学术工作能和外面的名牌学校、高等级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接轨, 使我们不太落后于形势, 少做一些盲目的事。所以我们开这个会, 并请了外校的专家, 希望能听听专家的指导意见。首都师范大学语言中心的成立, 得到了各界的支持, 我们主观上也想做点事情。第一本小书《语言》出来了, 我们在想下一步应该做点什么。一本小刊物要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概需要十年至二十年。我想能不能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 这就需要现在起步的时候考虑得长远一点, 少走点弯路。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个是就研究内容上说的, 第二个是就我们的《语言》刊物的办刊方式上说的。这两个问题讨论清楚了, 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必定很有意义。

陆俭明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在是世纪之交, 过不了多久, 就是二十一世纪了。九十年代以来, 应该说大陆的

语言学是一个兴旺的时期。投入到语言学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是纷纷成立了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机构。首都师大能成立语言研究中心就是语言学界的一件大喜事。我很抱歉, 当时病了, 没能参加成立大会。不光是首都师大, 有好几个单位, 有北京的, 也有外地的, 都成立了语言研究机构, 这说明语言学在大陆的地位正在开始提高。今天首都师大《语言》编辑部——我想可能不光是《语言》编辑部, 也是首都师大语言研究中心——出了这么一个题目: 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语言研究, 我想这个题目是很好的。在即将告别二十世纪,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期, 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二十一世纪里应该怎样研究汉语言, 我想应该和二十一世纪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和应用结合起来。科学是服务于人类的, 语言学也不例外。而且时代越是需要, 它的价值与地位就越是上升。一门学科的发展, 是依附于时代的需要的。二十一世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只能预测。根据二十世纪后半叶, 特别是八、九十年代语言研究的发展趋势来预测。我想二十一世纪是不是有这样几个特点:

我想第一个特点, 就是加速推进信息化, 而且信息科技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第二个特点就是知识经济, 经济全球化。我自己的体会, 所谓知识经济, 就是说, 以后衡量一个地区也好, 衡量一个单位也好, 衡量一个国家也好, 他的潜在的实力, 不是像过去那样看他生产多少吨钢, 多少吨煤, 多少吨石油, 而是看他科技含量怎么样, 知识水平怎么样, 看他技术、资本输出怎么样。你看美国到底生产多少吨钢啊, 它有多少吨煤啊, 老是看钢多少, 煤多少, 那是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过去的水平, 现在不能这样看。现在, 即使谈钢的产量, 也要看的科技含量, 特别是高科技含量。有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 前一段钢的价格普遍下滑, 国内的钢铁企业都赔钱, 惟独只有一个企业赚钱, 那就是武钢, 它的产品供不应求。为什么? 新的领导人上台后, 进行彻底的改革, 把原来旧的体制、旧的生产线都去掉了, 生产含高科技的新钢材, 结果人家亏本他赚钱。这很说明问题。因此以后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竞争, 单位和单位之间的竞争,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 甚至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 主要体现在科技的竞争, 知识的竞争。现在有这么一个口号, 信息转化为知识, 知识转化为经济。而知识全球化, 我的体会, 最核心的含义, 就是今后在资本、技术、人才上, 随着的市场经济的需求在全球流动、组合。

我们一旦进入 WTO, 这种知识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我想这应该是 21 世纪的两个特点。当然, 现在国际上朝着多极化发展, 不像过去一个中心或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而且整个世界朝着人、自然、社会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那么,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给语言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 在我看来, 首先就来自应用。譬如, 我国的信息科技、信息产业要发展, 就离不开中文信息处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进入千家万户, 地球越来越小。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国,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它的经济、政治、文化, 不能不和中国打交道。地球缩小了, 交流之间的一个障碍就是语言。现在都在集中力量研究日汉翻译、法汉翻译、英汉翻译等。过去我们都以为中文信息处理中国人应该是大拿。错了。原来我们以为字处理、词处理、语音识别大概我们做得挺不错, 现在看来最多平平, 有的优势在外国, 并不在我们这儿。现在我们唯一有可能能占优势的就是句处理。所谓句处理就是如何让计算机理解一个自然语言的句子的意思, 又如何生成一个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可能占优势, 但也只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来自美国、日本和欧共体。各个信息产业部门都在研究中文信息处理。而且现在这个挑战更面临一个人才的挑战。过去他们研究采用什么策略呢? 一个, 把我们的科研成果买断, 或者不买断, 买你的使用权。另一个, 高薪聘请我们的研究人员为他工作。还有一个, 他出钱请我们做课题。现在不一样了。从 1998 年开始, 他们直接进驻中国, 纷纷成立研究所。最重要的策略便是“以华制华”, 就是雇佣你的人才来研究中文信息处理。他所以采取这个策略, 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省钱, 更重要的是, 削弱你的力量就是增强我的竞争力。如果我们现在不抓, 不出三五年, 优势就跑到人家那边去了。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时代对语言学提出了挑战, 怎么在中文信息处理这个领域里占据制高点? 当然我们中国也在抓, 而且各人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还有一个比我们好的优势, 我们这里虽然也在抓, 但往往那种门户之见影响着团结合作, 而他们没有这种门户之见, 他们可以说是博采众长, 对你的各种理论、各种方法他都吸收, 只要认为对它有用。譬如说现在微软已经拿出汉语句子的语法树, 而且即将要推出句子的语义树, 这个比我们要走在前面。咱们先不管他推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有什么毛病, 不管怎么

说,人家已经推出来了,而我们还没有。他有了这个基础,再吸收中国的人员,可以改进,可以一版二版三版地改进,将来这方面的专利可能是人家的了。来自中文信息处理的挑战是汉语研究在21世纪所面临的首要的挑战。

另外一个进入21世纪,信息高速公路传遍全球,地球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而交往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2000年来临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谈话,认为在新世纪每一个年轻人至少应该掌握三种语言。这是很有远见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掌握自己的母语。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吃亏就吃亏在外语没学好,年轻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学外语,对外国人来说是学习汉语的问题。因此第二个挑战就是对外汉语教学。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不管是语音、词汇、语法,语音还好一点,都还不能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语法过去说得很多了,我想不用多说。外国人本能地用你老师教的语法去类推,而且能动地要去运用,一用就错。就是词汇方面,也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真正适用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从学习的角度来考虑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精品,但也还不是属于那一种性质的词典。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非洲学生写了这样一个句子:“汽车在公路上奔驰,公路两旁的稻田里,农民们正在辛勤的工作。”我们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用“工作”不太合适,应该用“劳动”,应该用“干活”。他拿出《现代汉语词典》,“工作”的注释“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农民们在地里是不是从事体力劳动?这不是符合“工作”的注释吗?用“工作”有什么不对?《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必去改,问题是我们需要一本从学习者的眼光来考虑的释义词典,这种词典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因此,怎么适应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无论从词汇上,无论从语法上,都需要加强研究。现在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去年年底教育部开了一个“全国第二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陈至立部长提出:“对外汉语教学,这是民族和国家的事业。”过去都把对外汉语教学看作小儿科,不光是中文系的教员去教,什么资料员啊、秘书啊,只要是能说中国话,都可以去教。当然那是大发展的时候,我们不能苛求。但是我们不能满足这个,特别是二十多年来,一个独立的对外汉语学科已经逐步形成。我们不能满足于只要能教下来就行了。如何让一个零起点的外国人到中

国来能够尽快地掌握汉语，我觉得这是对外汉语教学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从这一点来审视我们的教材、审视整个对外汉语教学。这几年我对对外汉语教学也比较感兴趣，搜集了一些材料，也看了一些课本。我觉得，说实在的，一个零起点的外国人到中国来第一年究竟教给他多少汉字、多少词，哪些汉字、哪些词，哪些汉字、哪些词先出来，复现率多少，这类问题心中都没数，汉字、词汇如此，语法也如此。不光如此，真正作细了，还得分门别类，譬如分英语区来的、法语区来的，等等。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第三方面的挑战就来自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小学语文教学从 1997 年年底开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大家纷纷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不满。1998 年 12 月，在北大召开了“张志公先生语文教学思想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由北大和其他一些单位联合发起的，因此我们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郝斌同志、中文系的领导也参加了。在这个会上，我们学校的领导人指出，现在的语文水平在滑坡。北大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要说大学生，就是研究生写出来的东西也不通。我们中文系的领导说，刚才校领导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我们中文系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应该说是全国的文科尖子，入学时候的作文写得都不错，到了北大以后就差了。这是不是象古代所说的，原来在南方是橘子，到了北方以后就酸了呢？这反映了一定的问题。21 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才的才体现在什么地方？就在于知识。譬如现在出去找工作，三个条件不可少：母语的语文水平和语文修养，外语，计算机。三个条件越好，找的工作越好。我们现在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汉语水平、语文表达能力、语文水平和语文修养，如何改进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当然除了这些方面的问题以外，来自应用方面的挑战还有许多。譬如说领域语言的研究问题，如法律语言、新闻语言等，这些方面过去也有研究，但是开展得还很不够。特别象法律语言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过去许嘉璐曾经在会上呼吁过，并指出真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寥寥无几。这些方面都是来自应用方面的挑战，来自应用的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会获得新的认识，会产生新的理论。

那另一方面呢，昨天我们正好参加了语言所的五十周年的所

庆,在会上,江蓝生副院长、沈家煊所长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谈到过去语言所有的一个薄弱的地方,就是理论的思考不够。这个方面确实是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弱项。因为我们过去强调的是苦学精神、乾嘉学派的学风,我进了北京大学不止一次听王力先生讲“例不十,法不立”。这个我们牢记在心。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来要求学生,这个是对的。这就是要求求实。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理论意识是比较淡薄的。譬如说现在一谈到理论,都是从国外来的。一说到层次,那是布龙菲尔德和威尔斯,动词中心论和配价,法国的特斯尼耶尔,格理论,菲尔摩,变换,哈里斯,转换,乔姆斯基,都是人家的。其实这些思想,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们前辈的语法著作里都有这种思想的体现。可惜的就是没有理论上的升华,没有从理论上来加以论述。这是很可惜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向西方学习。譬如美国要求一篇论文没有标新立异的观点就不能拿出来答辩,而不是看你的材料怎么样,首先看你有没有新的观点。跟我们的风格很不一样。

冯胜利 (美国堪萨斯大学终身教授):《语言》确实很好,无论从设计还是出版质量,都很不错。我从前在国外,看到国内出版的书,质量很不错,但歪歪扭扭的,一放在书架上就觉得不舒服。我刚拿到这本书,还没有看内容。刚才陆先生讲的话我很受启发。呆会儿我再说吧。

张炼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大家刚才对《语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好评。我是这个学校的,我现在不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而是“关起门来说亮话”。大家都很有客气,对《语言》说了很多好话,其实,这个刊物的质量,在学术性上,还是不够的。大家对它的封面等各方面的表扬,我们很感谢,但是呢,我们心里有数。我想,假如有一个学生,交一篇论文给老师,老师说:“你的字儿写得很好。”恐怕这个学生会想到,这篇论文会不及格了吧。(众人笑)当然,如果这是书法家的学生,比如说欧阳中石先生的学生,老师不仅说他们论文内容好,而且说他的论文的字写得好,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书法这个专业要求字写得好。从办我们这个杂志来说,我们是尽了力量的。但是限于各种条件,离理想的目标,当然还是很远的。所以,周建设教授说,

一般地说，一个杂志要办十年八年才能在社会上有点影响。不过，周教授很有雄心，争取用更短的时间使《语言》在社会上有点影响。但是要付诸实践还是很难的。难在哪儿？有什么问题？我想，有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刊物的性质上。很明显，它是语言研究中心的刊物，与一般的刊物不一样。比如《中国语文》，它是面向全国，《汉语学习》呢，情况也不太一样。《语言》应该反映语言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组织一定数量的外稿，是有必要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应该是反映语言研究中心本身的研究成果。而要反映本身的研究成果，就必须有语言研究中心自己的拿得出手的文章，否则，杂志的性质和质量就不能保证。这个杂志，它在某种意义上和学报一样。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学报面向的是全校教师——当然也有外稿，也面向社会——，而《语言》主要面向学校的一部分教师——语言课教师，因而提供稿件的人少一些，稿件来源有限，从而增加了组稿的难度。《语言》这个刊物要生存下去，并要有发展，当然光靠封面是不行的（众人笑），应该在稿件质量上多下工夫。

此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语言研究中心应该有一点行政上的措施。研究中心的成员，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个刊物。怎么支持呢？我以为，语言研究中心的成员应该把自己的最好的文章首先投到《语言》，不要把高质量的文章首先投到别的刊物，二流的文章才投到《语言》来，这不行。我想，应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就算不能说这是行政措施吧，也是一个措施，——这样要求是不过分的。当然，这不能靠命令，希望大家尽力支持。这也是一种责任吧。

新世纪到了，“面向 21 世纪的汉语研究”这个题目是很大的，刚才陆俭明先生讲过了，讲得很具体。我是爱听他的发言的，因为他的发言有个特点，不是光说理论，也讲实际的东西。这跟他写的文章是一样的，真是“文如其人”啊。——这不是我故意称道你（对陆俭明），虽然我不是搞语法的，未必能说到点子上。一般说来，要做到有理论又有事实是很难的。我当然是赞成理论跟实际相结合的，但也可以重点谈一面。作为强调的一面，我觉得理论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呢，吃亏呀，实际上哪个方面都不行。我想，理论这一面，拿修辞学来说吧——我自己是搞这个的，多说两句——有不少问题不好处理，自陈望道以来，直

到现在都解决不好, 有时“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这实际上是因为理论不够。如果放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去看问题, 就可以找出可以言传的规律。不少人讲修辞现象, 还仅仅把它放在上下文中去领悟、体会, 依靠直感式, 就像金圣叹评《水浒传》, 想到哪儿, 评到哪儿, 缺乏理论概括, 没有严密的系统, 这种办法是不行的。同样, 语法学什么的也是这样, 研究要有理论指导和严密系统。最近, 我翻了一些认知语言学方面的书, 你(指陆俭明)给袁毓林先生的书写的序我也看了。认知语言学, 我觉得它很有意思。不光有意思, 还很有意义。有些问题, 研究的时候, 有了理论跟没有理论就是不一样, 有某种理论跟没有某种理论就是不一样。比如认知语法理论, 戴浩一拿来研究汉语, 就发现了汉语语法遵循时间顺序原则。有些跟修辞沾边的语法现象, 我考虑过。比如说名词活用为动词。这是老生常谈。我翻了好多书, 从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到现在的好多书, 包括在座的洪成玉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教材我也看了。许多古代汉语教材——我不敢说全部, 但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在讲这个问题时, 都离不开从语法结构作解释, 王力先生和郭锡良先生他们的书在讲名词活用作动词的时候, 就是这样处理的。有的书说, 怎么知道某一名词活用作动词了呢? 如果有个名词, 前面有个“而”字, “而”不是连接名词的, 是连接动词或形容词的, 这里的这个名词既然本来不能被“而”连接, 也不是形容词, 所以是用作动词, 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对此作了细致的描写。对不对呢? 规律概括得是否全面另说, 但这是一个办法, 就是看语法结构, 找到形式上的依据, 操作起来也容易。不过, 再进一步问一句, 这种语法现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没有回答, 只有描写, 没有解释。认知上有一条规律, 叫象似性, 与修辞上的比喻, 或者说隐喻是相通的。这类名词活用为动词的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 在早期白话里也有。比如《红楼梦》中“宝玉听说, 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里的“猴”, 就是名词活用作动词了。这种现象, 是以语言的象似性、语言的比喻或隐喻为基底产生的, 可以从认知方面作出解释。我想写篇文章, 题目叫做《从象似性与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写, 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新的研究的视觉。我们当然不否定别的分析方法, 如王力先生那样的分析方法。当时, 认知语法学的理论还没有兴起, 或者说至少还没盛行, 所以王先生没有用这个理论来作解释。最近, 我看到蒋绍愚先生的一

篇文章(题为《抽象原则和临摹原则在汉语语法史中的体现》),研究先秦汉语中“于+L”(投其璧于河)是放在动词后边的,其后逐渐发展,形成既有“在+L”放在动词的后边,也有“在+L”放在动词的前边的现代汉语格局。为什么这样呢?他作了解释,是联系认知语法学的理论来解释的。这是从认知的角度去看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这个问题,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没有这么谈过。他没有联系认知语法学理论来谈。当时认知语法学还没有兴起,或者说至少还没有盛行嘛!王力先生说过“语言里只有习惯,没有天经地义”(这话见于王力《汉语语法纲要》的“导言”),所以重在语法结构的描写。这跟索绪尔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这割断了本来就客观地存在着的语法结构跟人的认知的关系。可见,有了新的理论,就会有新的视觉,有了新的视觉,老问题也会研究出新成果。这样,老问题也就不老了。当然,研究是可以多角度进行的,也可以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有交叉,可以互补互济。多开一个窗口,就多一个视点,多吸收点新鲜空气。

我深深感到语言理论的重要性,也深感自己的语言理论的薄弱。我们语言研究中心也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不然,虽说“例不十,法不立”,有一定的语言事实,就可以立法,但如果没有理论,即使有了十个例子,也不能真正立法;如果有了理论,真正看到规律性所在,即使只有八个例子,也可以立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语言研究,归纳重要,演绎也同样重要。总而言之,语言研究要依靠语言事实本身,这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推翻的。但是,不能说只要掌握语言事实就成,研究必须有理论指导。

陈波(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想说一点。在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中,语言和语言学所占的地位特别突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我认为有几个因素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

一是数理逻辑产生的方法、理念的渗透,产生了一大批语言学成果。如乔姆斯基、蒙太古的语言研究。

二是哲学观念的渗透。二十世纪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如维特根斯坦“词语的意义即用法”这个观点就是如此。语言不仅是工具,它也有某种本体地位。它

是文化的载体。

三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影响。人机交互、自然语言理解、语音识别, 刚才陆先生也谈到了, 这些, 对语言学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课题。

这些因素, 使语言成为不同学科共同言说的对象, 产生了一大批语言研究成果。在这种条件下, 《语言》应该怎么办? 我提出一个建议:

1. 语言是不同领域的人共同言谈的对象, 应该允许多种言说方式的并存。可以有大理论的, 也可以有一个极小极小问题的, 也可以有介绍新理论的, 提出新思想的。

2. 中西方语言研究都有自己的传统, 因而, 中国研究语言学的传统不能放松, 但我建议, 重点应该放在现代语言学上。比如方法, 应该有逻辑的方法、语用的方法、语义的方法、语言哲学的方法、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数理语言学的方法等等, 即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语言。

3. 论文的形式也可灵活些,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可以有大理论的, 也可以有一个极小极小问题的。文字也不要有限制, 八千字这个限制可以不要, 说真的, 有时候, 八千字说不清一个问题, 我觉得, 不妨有两到三万字的文章, 只要有真家伙在里面。但不能都这样, 否则就只能发几篇了, 但有几篇在里面, 就可以提高《语言》的学术品位和学术质量。再一个, 就是怎么给《语言》定位了, 是把它办成语言中心的刊物, 还是一个面对整个语言界、文化界的刊物, 我建议, 可以把它办成后一种。如我们北大哲学系办的《哲学门》, 并不是只面对哲学系, 而是面对全国的哲学界。各个大学哲学系的主任都是它的编委, 而哲学系教师的稿子有限额, 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 这样呢, 就可以把刊物的学术品位、学术质量提升一下。不少刊物, 都把语言作为专门的言说对象, 但使语言面对整个知识界、文化界的却几乎没有。我希望《语言》成为这样的刊物。

徐通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人帮垮台以后, 出了不少刊物。《中国语文》《方言》《国外语言学》等等, 这些是语言研究所的, 而《汉语学习》《语文研究》《语言研究》等则是地方上主办的全国性大刊物。这些刊物的出现, 说明语言学的发展有了新兴的气象。现在跟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不同了,

不光出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好刊物，还建立了不少研究机构，首都师大的语言研究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与八十年代相比，是个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呢？恐怕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关。前不久，鲁川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一次关于科学发展的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很好，讲到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在 21 世纪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两门科学都涉及到语言学。信息科学也好，生命科学也好，它们的发展如果涉及不到语言学，或者说，语言研究得不到发展，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那么，这两门科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阻碍。把语言学纳入到这整个科学发展的思潮中去认识，就会较容易地把握住语言学发展的脉络和方向。其实，什么是信息时代，什么是生命科学时代，我们现在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自觉不自觉的意识，认清时代发展的方向，我想对语言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现在，大家都重视语言学，不光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很多要求，如中小学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计算机的语言信息处理等，就是在时代发展的脉搏上头，也对语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学的发展迎来了大好时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是比较强调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语言学有希望、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三大传统。19 世纪的时候实现了印度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的结合，诞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推进了描写语言学的发展，使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提出了汉语研究传统跟印欧语研究传统的结合，《马氏文通》就是这个结合的产物。这两个研究传统的结合，由于语言结构基础的差异，实现起来疙疙瘩瘩的，步履艰难，毛病比较多，问题比较多，但毕竟进行了结合，方向是对头的。不结合，对语言学的发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么，怎么结合？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姚小平同志给我写了个有关语言学史的材料，其中提出一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这就是 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语言学。这是中国语言学的转型和转向的时期，涉及的问题很复杂，应该成为一个研究的课题。现在是 20、21 世纪之交，语言学又处于一个转向的时期，应该好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印度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的结合为什么那么成功？汉语研究的传统与印欧语传统的结合为什么那么困难？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很值得思考。

《马氏文通》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时期，诞生了汉语